

失落的真相

—晚清戊戌變法時期的‘合邦’論與戊戌政變的關係—

雷家聖(台灣大)

- | | |
|-----------------------|---------------------|
| I. 前言 | IV. ‘兵圍頤和園’與‘合邦’的計畫 |
| II. 戊戌變法前的‘合邦’論 | 1. 譚嗣同密會袁世凱 |
| III. 伊藤博文來華時的‘借才’之議 | 2. 英日與俄國開戰的謠言 |
| 1. 洪汝沖‘借才’、‘聯邦’之議 | 3. ‘合邦’計畫的提出 |
| 2. 李提摩太來到北京 | 4. 先發制人：慈禧太后的政變 |
| 3. 伊藤博文來華後的‘借才’之議 | 5. 英國與日本的角色 |
| 4. ‘借才’之議的反對者與慈禧太后的反應 | V. 結論 |

I. 前言

光緒二十年(1894)至二十一年(1895)的中日甲午戰爭，清朝慘敗，北洋艦隊全軍覆沒，清朝的欽差大臣李鴻章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賠款白銀二萬萬兩，割讓台灣、澎湖。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到北京，當時在北京參加科舉考試的各省舉人，在康有為的號召之下，聯名上書清廷，請求光緒皇帝拒絕承認馬關條約，繼續對日本作戰，此即「公車上書」事件。

雖然「公車上書」轟動京師，使康有為聲名大噪。但是光緒皇帝最後仍然承認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甲午戰爭結束後，康有為認為中國需要更進一步改革，於是成立了「強學會」，積極鼓吹變法。光緒二十四年(1898)，光緒皇帝召見康有為，對康有為的變法主張甚為感動，於是在四月二十三日(陽曆6月11日)，正式下詔「更新國是」，開始了「百日維新」。

這場「百日維新」運動，在一百零三天之後，因為慈禧太后重新訓政而結

束，光緒皇帝被軟禁，康有為逃亡海外，康廣仁、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楊深秀等六名變法派官員被殺，史稱「戊戌政變」。戊戌政變發生的原因，一般的看法認為是頑固守舊勢力的反撲，慈禧太后即是守舊派的領袖。不過，光緒皇帝從小對慈禧即十分畏懼，如果慈禧反對改革，大可在光緒宣布「更新國是」之時，加以阻止，所有改革計畫也就煙消雲散了，為何會放手讓光緒「胡鬧」了一百零三天才發動政變？這是許多史家質疑這一說法的原因。

另一種說法認為政變的原因是由於袁世凱告密。八月初三(9月18日)夜，譚嗣同密訪袁世凱，說以誅殺直隸總督榮祿、兵圍頤和園等事。八月初五(9月20日)，袁世凱返回天津。袁世凱向榮祿告密的時間，最快也當在八月初五的晚間之後，而八月初六(9月21日)，慈禧太后即發動政變。慈禧如何能在一夕之間得知天津的密報並策劃政變？時間上過於緊迫，使得許多史家也質疑這一說法。¹⁾

因此，戊戌政變的原因究竟是什麼？這一問題困擾了許多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專家學者。中國大陸學者茅海建即指出：“慈禧太后為什麼八月初五日決定將回頤和園的日期推遲到初十日、為什麼於初六日親政，對於我來說依然像謎一樣纏繞在心。”²⁾ 本文則將由光緒二十四年七月逐漸出現的「借才」、「合邦」計畫，來探討慈禧太后發動政變的真正原因。

本人對於戊戌政變的原因，曾撰有『力挽狂瀾－戊戌政變新探』（台北：萬卷樓，2004年12月）一書，提出了與以往研究成果大異其趣的新解釋。拙書指出，戊戌變法期間，尤其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來華之後，伊藤博文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遊說康有為等變法派官員，接受其「借才」之提議，並利用變法派官員掌握決策核心的便利，意圖實行其「合邦」的陰謀。對於可能阻礙「借才」、「合邦」計畫的慈禧太后與榮祿，康有為、譚嗣同

1) 據黃彰健考證，榮祿將袁世凱告密的內容，於八月初七(政變後一天)才派人告知慈禧，慈禧在八月初九下令逮捕譚嗣同等人。因此袁世凱雖有告密之事，但並非政變的原因。參見黃彰健，「論戊戌政變的爆發非由袁世凱告密」，收於黃彰健，『戊戌變法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 54，1970）。

2) 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元月），p.163。

等人則打算利用袁世凱的軍隊‘殺榮祿、兵圍頤和園’。慈禧太后是在明瞭情勢險峻之後，才當機立斷發動政變，挽救了此一危局。本文將根據拙書的主要論點，對一些尚有待更深入說明之處，進一步加以討論與分析，作為該書的補遺。

II. 戊戌變法前的‘合邦’論

所謂‘合邦’，這一詞彙源自日本，日人森本藤吉在明治二十六年（光緒十九年，1893）發表『大東合邦論』一書，鼓吹日本應該與朝鮮合為一國。森本藤吉自言：「今日急務，莫如合我與朝鮮為一大聯邦，著一書曰『大東合邦論』。」³⁾ 森本藤吉解釋提倡合邦的理由：

國人嘗有唱征韓論者，夫戰而取之，則必疲靡國力，以買其怨。論者知之，而猶欲取之者，恐外人據此地也。今協議以合之，其為大幸。果何如也？蓋持大公以合之，則我不用兵而取朝鮮也，朝鮮亦不用兵而取日本也，一將之功不成，而萬人之骨則無枯矣。以費于兵爭之資，誘朝鮮之開明，則是不買怨而樹德也。合邦豈日本之不利哉？⁴⁾

森本認為以軍事力量佔領朝鮮，是‘疲靡國力，以買其怨’的吃力不討好之舉；若是採用合邦的辦法，則可不費一兵一卒，‘誘朝鮮之開明’，達到控制朝鮮的目的。顯然森本藤吉主張採取這種方式，取代軍事上的佔領征服，達到兼併朝鮮的目的。所以說穿了，‘合邦’只不過是藉團結合作之名，達到侵略兼併的目的，是日本野心家對朝鮮的政治宣傳口號而已。

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日本控制了朝鮮的軍政大權，對於與日本作對的朝鮮王妃閔氏，日本發動了「乙未事變」，由日本軍隊包圍皇宮，而後派殺手入宮刺殺閔妃。在日本的壓迫之下，朝鮮國王高宗李熙在光緒二十二年（1896）

3) 森本藤吉，『大東合邦論』（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藏本，東京：明治二十六年八月刊本），「岡本監輔序」，p.1.

4) 森本藤吉，『大東合邦論』，「合同利害」，pp.120-121.

逃至俄國公使館，並在俄國的保護之下，下令逮捕親日派官員。日本侵略朝鮮的企圖，暫時受到了挫折，‘合邦’的計畫自然也無從實現。

然而，在戊戌變法前夕，‘合邦’一詞卻在中國出現。而且提倡‘合邦’者，竟然是在「公車上書」事件中慷慨陳言、主張繼續對日本作戰的康有為。據康有為『自編年譜』記載，光緒二十四年四月戊戌變法開始之前，“時與日本矢野文雄約兩國合邦大會議，定稿極詳，清(請?)矢野君行知總署答允，然後可大會於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⁵⁾可見當時的康有為已經受到日本人的影響，準備與日本駐華公使矢野文雄召開「合邦大會議」了。矢野文雄其人，曾任職於日本政府大藏省，其後進入「報知新聞」工作，又在伊藤博文的推薦之下，再度進入政界，明治三十年(1897)被任命為日本駐中國公使。⁶⁾可見矢野文雄與伊藤博文關係深厚。而康有為在積極鼓吹變法之時，竟然與日本公使矢野文雄共同計畫召開「合邦大會議」，確實令人感到奇怪。

事實上，日本在甲午戰爭之後，積極拉攏中國的朝野知識份子，希望改變中國的反日情緒。光緒二十二年(日本明治二十九年)，日本政界大老犬養毅主張“對於中國問題，則殊不易辦，故確立對華政策，實為當務之急。”勸告當時的內閣派人調查中國問題。當時的日本外相大隈重信即派遣可兒長一、平山周、宮崎寅藏三人，以外務省諮議的名義前往中國華南，調查革命黨的活動情形。光緒二十三年(1897)，‘大陸浪人’宗方小太郎在上海與李盛鐸、羅誠伯、梁啟超、汪康年等人來往，商討復興亞洲的策略。據宗方的日記記載，李、羅等人認為“日清聯合之事，為在野志士所熱望，無論政府方針為何，兩國志士之互助合作，實為當務之急”；梁啟超則說“中國之天下為滿人破壞，欲圖挽回，非脫離滿人之羈絆不可。”可見當時的中國知識份子，由於甲午戰爭的刺激，又看見日本因變法而強的事實，並在日本工作人員的遊說之下，走上了親日的道路。⁷⁾

光緒二十四年(明治三十一年)春，正當康有為受光緒皇帝召見，中國的變

5) 康有為，『康南海自訂年譜』(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p.47。

6) 關於矢野文雄的生平，參見小栗又一，『龍溪矢野文雄君傳』(東京：大空社，1993)。

7) 石錦，「甲午戰後日本在華的活動」(『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第11編，『中日甲午戰爭』)，pp.810-814。

法改革指日可待之時，日本成立了「東亞會」，邀請康有為的弟子羅孝高入會，並與橫濱、神戶兩地的大同學校(康有為弟子在日本設立的學校)取得聯繫，以進一步拉攏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此外，宗方小太郎、井手三郎等「大陸浪人」，更積極聯絡中國方面的親日人士。井手三郎回日本後，在貴族院議長近衛篤磨公爵的支持之下，又成立了「同文會」，計畫在上海設立同文會館，以促進「日清兩國有志者的合作」。⁸⁾

由此可見，康有為與日本公使矢野文雄主張召開「合邦大會議」，並非孤立事件，當時日本正有計畫地拉攏中國知識份子，為日本進一步擴張在華勢力鋪路。康有為及其弟子梁啟超，都是日人積極爭取的對象。而康有為與矢野文雄所計畫的「合邦大會議」，即是日本在中國擴張利益的手段之一。

III. 伊藤博文來華時的‘借才’之議

1. 洪汝沖‘借才’、‘聯邦’之議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光緒皇帝下詔「更新國是」之後，以康有為為核心的變法派，開始推動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包括裁減舊機構、西法練兵、改革科舉制度(廢八股考試，改試策論)、設立新式學校、發展工商業等。然而，正在各種改革政策不斷推出之際，七月二十四日，刑部主事洪汝沖上書光緒皇帝，提出了遷都、借才、聯邦三策，認為是變法自強的本原大計。洪汝沖除了建議遷都於荊襄之外，對於‘借才’一策，洪汝沖說道：

職以為不倣行西法則已，苟倣行西法，則一切內政，尤當廣聘東西各國名士，畀以事權，俾資贊助，收效必宏。⁹⁾

8) 邱榮裕，『東亞同文會と中國の政治改革(1898-1911)』(京都：立命館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課程博士論文，2001)，pp.39-42。

9) 洪汝沖，「呈請代奏變法自強當求本原大計條陳三策疏」，收於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上海：神州國光社，1953年初版)第二冊，p.364。茅海建考證洪汝沖上奏的

洪汝沖主張由‘東西各國名士’來管理中國內政，並且‘畀以事權。’洪汝沖並提到了他心目中的人選：

甲午之役，則伊藤、陸奧，名震寰區。近日伊藤罷相，將欲來遊，藉謁國是。皇上如能縻以好爵，使近在耳目，博訪周咨，則新政立行。¹⁰⁾

可見洪汝沖的理想人選，是剛剛卸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

洪汝沖的另一主張為‘聯邦’，洪汝沖說道：

爲日本者，所親宜無過中國。……此事若在歐西，即合爲一國，亦不爲怪，挪威以合於瑞典而得自存，匈牙利以合於奧地利而以不滅，他如意、德以衆國合成而稱帝制。……中國之自強，惟在日本之相助。¹¹⁾

洪汝沖的聯邦主張，實際上就是中日兩國合併。洪汝沖並舉挪威、匈牙利等國合併於大國，以及德國、義大利諸小邦合爲一國的例子，來說明‘聯邦’的好處。

洪汝沖希望重用東西各國之士(尤其是伊藤博文)並授以事權，甚至最後與日本‘合爲一國。’如果此一計畫果真實現，中國將置於日本人的控制之下，淪爲殖民地的地位。也許這只是洪汝沖閉門造車的個人之見。光緒皇帝接獲此一奏摺後有何反應，我們不得而知。不過，洪汝沖提到伊藤博文‘將欲來遊’，似又爲日後的發展預留伏筆。兩天後，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伊藤博文抵達中國。

2. 李提摩太來到北京

時間應爲七月二十四日，參見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p.96。

10) 洪汝沖，「呈請代奏變法自強當求本原大計條陳三策疏」(『戊戌變法』第二冊)，p.364。

11) 洪汝沖，「呈請代奏變法自強當求本原大計條陳三策疏」(『戊戌變法』第二冊)，p.365。

正當伊藤博文即將來到中國之際，康有為邀請了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自上海赴京。李提摩太其人，曾於甲午戰後撰有「新政策」一文，文中主張：

- 一、宜延聘二位可信之西人，籌一良法，速與天下大國立約聯交。……
- 二、宜立新政部，以八人總管，半用華官，半用西人。……
- 三、（鐵路）仍電請西國辦理鐵路第一有名之人，年約四十歲者與之商辦。……
- 四、某（按：即李提摩太自稱）力強年富，心計最工，在新政部應總管籌款借款各事。……
- 五、中國應暫請英人某某、美人某某，隨時入見皇上，以西國各事詳細奏陳。
- 六、國家日報，關係安危，應請英人某某、美人某某，總管報事。……
- 七、學部為人才根本，應請德人某某、美人某某總之。……
- 八、戰陣之事，素未深諳，應專精此事之人保薦人才，以備任使。
- 九、以上各事，應請明發諭旨。……¹²⁾

李提摩太希望中國將外交、新政、鐵路、借款、報紙、教育等權力，皆交由西人掌管，想要以聘用西方人才之名，行攘奪中國政權之實。當時李提摩太的主張，並沒有得到清朝方面的重視。

光緒二十四年夏，正當百日維新剛剛起步之際，康有為曾經與李提摩太見面，李提摩太並建議康有為：鑑於伊藤博文已經使日本變成一個強盛的國家，對中國政府來說，最好的辦法就是請伊藤擔任皇帝的顧問。而在伊藤博文來到中國之時，康有為又邀請李提摩太來到北京，並希望他擔任皇帝另一位外國顧問。李提摩太抵達北京後，與伊藤博文住在同一所旅館，並與伊藤博文的秘書津田先生進行了長談。¹³⁾ 李提摩太推薦伊藤擔任中國的顧問，兩人又住在同一旅館，可見兩人關係非常密切。而康有為心目中的兩個外國顧問，便是李提摩太與伊藤博文。因此日後李提摩太向康有為提出的種種建議，伊藤博文應該知情甚至參與其中。

3. 伊藤博文來華後的‘借才’之議

12) 李提摩太，「新政策」（『戊戌變法』第三冊），pp.239-240。

13) 李提摩太 著，李憲堂、侯林莉 譯，『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p.245。

在伊藤博文抵達北京之後，各種‘借才’的主張開始出現。一方面，傳出了光緒皇帝要‘開懋勤殿’的消息，據梁啟超『戊戌政變記』的記載：

七月廿八日，決意欲開懋勤殿，選集通國英才數十人，並延聘東西各國政治專家共議制度，將一切應興應革之事，全盤籌算，定一詳細規則，然後施行。¹⁴⁾

可見所謂的開懋勤殿，除了延聘本國人才之外，還包括要延聘東西各國的政治專家，來共商新政大局。

在光緒皇帝決意要開懋勤殿的前後，變法派的官員們紛紛上書光緒皇帝，請求重用伊藤。七月二十六日，戶部候補主事聶興圻奏請光緒皇帝“知會歐美各國，其有賢能願客仕我中國者，即以客卿之位尊顯之。如此，則彼爲我盡其才能，斯新政更易成矣。”¹⁵⁾ 七月二十九日，宗人府主事陳懋鼎奏言：“皇上於其進見時，宣中國和睦之誼，詢彼國變革之序，於內政外交，兩有裨益。”¹⁶⁾ 八月初三日，江蘇松江府知府濮子潼亦奏言：“聞伊藤博文現因遊歷來都，擬請皇上優以禮貌，飭總理王大臣密問彼國維新諸政。”¹⁷⁾ 同日又有工部郎中福潤奏言：“現聞伊藤博文遊歷已至天津，如到京時，可否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大學堂管學大臣、農工商總局總辦前往面詢明治維新一切學堂、礦務、農工商局創辦規模，即將接談得失各情，詳晰繕單，恭呈御覽，以備采擇。”¹⁸⁾ 直隸候補知縣謝希傳，亦奏請趁日本伊藤博文來華之時，派員加以諮訪。¹⁹⁾ 平心而論，伊藤博文是明治維新的核心人物，的確能爲推行變法的中國官員們提供改革意見。因此，陳懋鼎、濮子潼等人希望光緒皇帝向伊藤「詢」、「密問」日本維新諸政，若是單純的諮詢性質，倒也無

14)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日本鉛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64初版）卷三，p.5下。

15) 聶興圻，「戶部候補主事聶興圻摺」（明清檔案館 編，『戊戌變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9初版），p.73。

16) 陳懋鼎，「宗人府主事陳懋鼎奏請降旨召見日本伊藤博文摺」（王彥威 輯，『清季外交史料』，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卷134，pp.19上-20上。

17) 濮子潼，「江蘇松江府知府濮子潼摺」（『戊戌變法檔案史料』），p.13。

18) 『軍機處錄副：光緒朝。補遺。戊戌變法項』，3/168/9453/54；『隨手檔』、『上諭檔』，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參見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p.97。

19) 謝希傳之奏摺，篇目見『戊戌變法檔案史料』，p.521。

可厚非。總之，在伊藤博文來華之後，如何向伊藤博文詢問變法的意見，成為官僚們上奏的熱門話題。

不過，有些人的建議就大有問題。例如貴州舉人傅夔，主張用伊藤為中國宰相，傅夔奏言：“日人素尚義氣，喜功名，既無異種之嫌，復有同洲之患，今伊藤之來，苟樂為相助，於我誠便，……且臣所以請皇上留相伊藤者，近世歐洲多有此例，以為美談，不以本國乏才為恥。”²⁰⁾八月初四，候選郎中陳時政亦上奏：“頃又聞日本伊藤，罷相來游中土，已至京師，將蒙召見。……如果才堪任使，即可留之京師，著其參與新政，自於時局更多裨益也。”²¹⁾也是要求讓伊藤博文參與新政。此一類說法，主張用伊藤博文當中國宰相或參與新政，不但有失國體，而且將國家大權交於外人之手，恐有不測之患。

就在伊藤博文抵華，光緒皇帝準備開懋勤殿，變法派官員紛紛上書請求‘借才’之際，『國聞報』八月初二日載：“近日又有擬開懋勤殿，令三品以上保舉人才，召見後派在懋勤殿行走，以備顧問之說。聞數日內，當即有明發諭旨矣。”²²⁾可見光緒將對開懋勤殿、聘用東西各國政治專家之事有所決定。而變法派官員所積極推薦的外國人才，即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

4. ‘借才’之議的反對者與慈禧太后的反應

由於有人提倡重用伊藤博文，因此引起了一些官員的警惕。八月初三，廣西道監察御史楊崇伊上書慈禧太后，楊崇伊說道：

掌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楊崇伊跪奏：為大同學會蠱惑士心、紊亂朝局、引用東人，深恐貽禍宗社，籲懇皇太后即日訓政，以遏亂萌。……風聞東洋故相依藤博文，即日到京，將專政柄。臣雖得自傳聞，然近來傳聞之言，其應如響。依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²³⁾

20) 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天津大公報社，1932年）卷三，pp.267-272。

21) 陳時政，「候選郎中陳時政摺」（『戊戌變法檔案史料』），p.197。

22) 『國聞報』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戊戌變法』第三冊），p.407。

23) 楊崇伊，「掌廣西道監察御史楊崇伊摺」（『戊戌變法檔案史料』），p.461。

由楊崇伊的奏摺中，我們可以看出，在伊藤博文抵達北京之後，有些官員建議以伊藤為顧問，有些人則主張重用伊藤，甚至用為宰相，因此造成各種‘傳聞’甚囂塵上的情形。而楊崇伊則堅決反對重用伊藤，認為伊藤如果‘專政柄’，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這種言詞，不可謂不激烈矣。

當時的慈禧太后，已經讓光緒皇帝親政，本身退居幕後，住在頤和園中。不過，根據茅海建先生的研究，慈禧太后仍然可以有效掌握朝廷的事務與皇帝的動向。其方式主要是一種‘事後報告制度’，慈禧對皇帝的硃批和早朝時的口諭，進行了監控。光緒親政之後，《隨手檔》中每天都有這樣的記錄：“繕遞某某日硃批摺件事由單”、“繕遞某某日早事傳旨事由單”、“繕遞某某日電旨某道。”此中的‘繕’，是軍機章京抄寫的意思；此中的‘遞’，是上呈的意思。而這些由軍機章京每天抄寫的‘硃批摺件事由單’、‘早事傳旨事由單’、‘電旨’是遞給慈禧的。²⁴⁾ 戊戌變法開始之後，這種‘事後報告制度’也沒有中斷。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緒下詔「更新國是」之日，當天的‘硃批摺件事由單’如下：

四月二十三日，廖壽豐奏解遞俄、法款銀摺，奉硃批：戶部知道；又奏副將湯鳴盛請留浙歸標補用片，奉硃批：著照所請，兵部知道；又奏解協黔餉銀片，奉硃批：戶部知道；又奏假滿病請開缺摺，奉硃批：著再賞假兩個月，毋庸開缺；又奏前安溪縣知縣戚揚學有根底請送部引見片，奉硃批：戚揚著交吏部帶領引見；又奏請將二十一年以前防軍報銷量免與扣平片，奉硃批：戶部知道；又奏上年分秋冬兩季釐捐數目摺，單一件，奉硃批：戶部知道，單并發。連順、德木楚克多爾濟奏查關卡倫摺，奉硃批：該衙門知道。德木楚克多爾濟奏到任日期謝恩摺，奉硃批：知道了。²⁵⁾

茅書認為：當日收到的京外奏摺的題由及硃批，全都上呈慈禧了，慈禧從這些簡要的報告中，可以大體明瞭各地的政事政情及光緒的態度。

此外，茅書又指出：每天最重要的奏摺及相關諭旨，軍機大臣須在當天上呈慈禧。例如四月二十三日軍機處奏片：

24) 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p.11.

25) 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p.13.

本日中允黃思永奏息借華款請聽商民自相勸辦摺，又奏集貲設立勸農學堂請旨試辦摺，又奏辦理永清一帶水利片，又奏皖北賑捐請重定章程片，均奉旨：存。謹將原摺片恭呈慈覽。謹奏。²⁶⁾

茅書認為：據此奏片，被光緒皇帝「留」的黃思永奏摺，軍機處當天就將其原件及光緒的處理意見上呈慈禧了。茅書並做了統計：從四月二十三日至八月初五日，軍機處一共向慈禧上呈了摺、片、呈、書等共計462件。對此，茅海建認為：名為歸政的慈禧可以看到百日維新的重要奏摺，包括軍機處都無法看到的‘留中’的摺件，基本上都送到了慈禧手中。²⁷⁾

慈禧太后在八月初三收到楊崇伊的奏摺之後，會有何反應？楊崇伊所奏之‘傳聞’，事關大清朝的存亡；“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一語，也令人驚心動魄。可是重用伊藤的說法，仍然只不過是某些官員的意見與官場上的傳聞，為此而貿然干預變法，也失之草率。因此，慈禧太后的作法，首先是加強掌握各種與新政有關的奏摺。茅海建先生指出：八月初三，軍機處給慈禧太后的奏片中，出現了政治權力的異常，該奏片內容為：

本日陳兆文奏保舉人才片，奉明發諭旨一道。閔荷生奏請將會館改學堂片、耿道冲奏請設保險公司摺，又二十七日胡元泰請清教案呈、宋汝淮條陳礦務河工呈，均簽擬辦法，恭呈慈覽，俟發下後，再行辦理。總理衙門代遞張元濟條陳摺一件、戶部代遞閔荷生、耿道冲條陳摺各一件、濮子潼條陳摺片各一件，均奉旨存。都察院代遞程格等摺呈，俟擬定辦法，再行簽呈慈覽。謹交陳兆文等各原摺、片、呈并昨日因應行鈔錄未及呈遞之孫家鼐、關普通武、陳季同、金蓉鏡、暴翔雲、霍翔各原摺恭呈慈覽。謹奏。²⁸⁾

對此，茅海建先生解釋道：光緒帝收到的奏摺分成兩類：有上奏權的衙門或官員的摺件，仍由光緒帝硃批、下旨；而沒有上奏權的司官士民之摺件，則交到軍機處進行‘酌議’，提出處理意見後，再送光緒帝，有如內閣之‘票擬’而負責處理後一類摺件的，正是於七月二十日奉命‘參預新政’的四名新任軍機章京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²⁹⁾因此，茅海建先生認為八月初

26) 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p.16.

27) 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pp.17-18.

28) 『上諭檔』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參見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p.65.

29) 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p.70.

三之後政治權力的變化，是原來由軍機處簽擬意見而交光緒帝決定的司員士民上書，從此移交到慈禧太后的手中。

此外，慈禧太后爲了進一步掌握光緒皇帝與變法派官員的意向，直接觀察光緒皇帝以及決策核心官員的看法，因此在八月初四，由頤和園返回紫禁城。

IV. ‘兵圍頤和園’與‘合邦’的計畫

1. 譚嗣同密會袁世凱

七月二十八日(9月13日)，正是光緒皇帝提出要開懋勤殿，延聘東西各國政治專家參與新政的時候，光緒皇帝賜楊銳密詔：

近來朕仰窺皇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登用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以爲恐失人心。雖經朕屢次降旨整飭，而並且有隨時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卽如十九日之硃諭(按：爲禮部六堂官被罷黜之事)，皇太后已以爲過重，故不得不徐留之，此近來實在爲難之情形也。……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漸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爲安，化弱爲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等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審處，再行辦理，朕實不勝緊急翹盼之至。特諭。³⁰⁾

光緒皇帝覺得慈禧太后“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登用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因此光緒皇帝要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人“妥速籌商，密繕封奏。”不過光緒皇帝的意思，可能並不是要“殺榮祿，兵圍頤和園。”如果是這種重大事件，光緒皇帝不會要楊銳等人的奏摺“由軍機大臣代遞”，更不會在上諭中說“又不致有拂聖意。”可見光緒皇帝只是想要楊銳等人提供更具說服力的說帖，來說服慈禧太后。不過，在

30) 「上諭」，《戊戌變法》第二冊，pp.91-92.

康有為、譚嗣同等變法派官員的心裡，卻不是如此打算。

八月初三(9月18日)夜，軍機章京譚嗣同密訪袁世凱，說以誅殺直隸總督榮祿等事。康有為在『自編年譜』中說：“(吾)乃屬譚復生入袁世凱所寓，說袁勤王，率死士數百扶上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³¹⁾可見譚嗣同是受到康有為的指示。根據袁世凱『戊戌日記』所述，譚嗣同出示一份上奏光緒皇帝的奏摺草稿，內容為：

榮某謀廢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凱初五請訓，請面付硃諭一道，令其帶本部兵赴津，見榮某，出硃諭宣讀，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為直督，傳諭僚屬，張掛告示，布告榮某大逆罪狀，即封禁電局鐵路，迅速載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圍頤和園，一半守宮，大事可定。如不聽臣策，即死在上前。

袁世凱見之大驚，問曰：“圍頤和園欲何為？”譚嗣同回答：“不除此老朽，國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問。”譚嗣同又說：“我僱有好漢數十人，並電湖南招集好將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無須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誅榮某，圍頤和園耳。”譚嗣同又出示光緒皇帝的硃諭，其內容大致如下：

朕銳意變法，諸老臣均不順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聖不悅，飭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另議良法。

這份硃諭應該即是七月二十八日光緒皇帝給楊銳等人的硃諭。因為譚嗣同所拿的是抄本，而非原本，所以袁世凱問：“此非硃諭，且無誅榮相、圍頤和園之說。”譚嗣同答道：“硃諭在林旭手，此為楊銳抄給我看的，確有此硃諭。……諭內另議良法者，即有二事在其內。”譚嗣同最後說道：“自古非流血不能變法，必須將一群老朽，全行殺去，始可辦事。”³²⁾

然而，袁世凱顯然並不認同譚嗣同的計畫。八月初五(9月20日)，袁世凱在晉見光緒皇帝之後，離京返回天津，並隨即面見榮祿。據袁世凱『戊戌日記』所載：

31) 康有為，『康南海自訂年譜』，p.67.

32) 袁世凱，『戊戌日記』（『戊戌變法』第一冊），pp.550-553.

抵津，日已落，即詣院謁榮相，略述內情，並稱皇上聖孝，實無他意，但有群小結黨煽惑，謀危宗社，罪實在下，必須保全皇上以安天下。³³⁾

可見八月初五晚上，袁世凱已將譚嗣同密謀殺榮祿、兵圍頤和園的大致情形，向榮祿稟告。

2. 英日與俄國開戰的謠言

八月初，正是伊藤博文來到北京，許多朝廷官員正在討論是否應該‘借才’的時候，在中國邊境卻傳來了英日兩國與俄國開戰的傳聞。八月初三，總理衙門收到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榮祿的三封電報，第一封電報稱：

初二日戌刻，接聶提督電稱：“昨下午六點鐘由營口來兵輪七艘，三隻泊金山嘴，四隻泊秦王島。風聞係英國兵艦，何以突來如此之多”等語。復於亥刻，又接該提督來電稱：“查沽子藥庫在塘泊(沽)南，現外國兵輪已泊塘泊(沽)口內，係在大沽子藥庫背後，相去太近，求飭羅鎮嚴加防備”各等情。除電飭羅鎮不動聲色暗為防探，並一面派委黃道建筦密赴塘沽查探。特先電聞，務望詢明英使何事，即先電示。一俟黃道查覆，再行電達鈞署。祿。蕭，亥刻。

第二封電報稱：

頃電想達，復於子刻接李鎮大憲電稱：“頃據榆防袁統帶飛稟：‘前電言洋河口、金山嘴來兵輪四艘，距岸二十里，查係英艇。復問來由，直謂俄國意甚不善，英廷特派來此保護中國’云云。”同時又接該鎮來電言：“復接袁統帶電稱：‘今日來英國魚雷艇二、兵輪一，連前共計七艘，內有提督座船一艘，齊泊定遠砲台前面，離岸約八里許。’職鎮准於初三日搭車赴關”各等情。查俄國現在並未開釁，該兵船所稱俄意不善、來此保護等語，不知何所見而云然？抑或他國捏稱英船，均不可知。特此電聞。祿。江，子刻。

第三封電報稱：

33) 袁世凱，「戊戌日記」(『戊戌變法』第一冊)，p.553。

昨據聶提督電稱：“外國兵輪泊入塘沽口內”，當派黃道建筦密往探視。頃據覆電稱：“職道已於初二日到塘沽，詳查口內，並無英兵船。塘沽只泊日本兵船一艘，查係前兩月所來。現口外亦無兵船”等情。……（已）電飭大沽砲台、山海關各口確實查探究竟何項兵輪？共有幾艘？現泊何所？俟查覆到時，再行電聞。祿轉。江，午刻。³⁴⁾

根據這三封電報，顯示八月初一傍晚，有英國軍艦七艘出沒於金山嘴、秦王島附近，八月初二又出沒於塘沽、榆關附近，英國軍艦人員並告訴清朝駐榆關人員：“俄國意甚不善，英廷特派來此保護中國。”可見英俄兩國似乎有在中國境內爆發衝突的可能。

由於英國兵艦來意不明，因此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榮祿調動軍隊，預作戒備。袁世凱即在譚嗣同前來密會之前，接到榮祿的命令。據袁世凱『戊戌日記』記載：“（初三）將暮，得營中電信，謂有英兵船多隻，游弋大沽海口。接榮相傳令，飭各營整備聽調，即回寓作復電。適有榮相專弁遺書，亦謂英船游弋，已調聶士成帶兵十營來津，駐紮陳家溝，盼即日回防。”³⁵⁾可見英國兵艦出沒之事，榮祿認為頗不尋常，故調動軍隊，以備不測。

此外，八月初三日，盛京將軍依克唐阿也電告總理衙門：

昨金州副都統壽長電稱：「日內傳聞英日俄在海參威開仗，旅大兩口俄人頗形慌亂。昨派人密往大連灣探試，頃又據回稱，果見俄國鐵甲船一隻，受砲彈甚重，開仗之說，衆口紛紛。查海參威與琿春接壤，該三國果在該處開仗，中國固處局外，然亦利害所關，似未可置之度外」等語。當電准吉林查覆，毫無見聞。密電琿春派人偵探。後又據壽長電稱：「探明金州城外，南營房所屯俄兵業已奉調開拔，聞係會同旅大兩口俄兵，赴海參威助戰，現在南營內僅留十餘人看守」等語，謹以奉聞。依克唐阿。江。³⁶⁾

可見當時在中國東北的盛京、金州等地，也傳出了英日兩國已向俄國開戰的謠言。

八月初四，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榮祿又電告總理衙門：

34) 以上三封電報，見黃彰健，「論戊戌政變的爆發非由袁世凱告密」（『戊戌變法史研究』），pp.523-524。

35) 袁世凱，『戊戌日記』（『戊戌變法』第一冊），pp.549-550。

36) 參見黃彰健，「論戊戌政變的爆發非由袁世凱告密」（『戊戌變法史研究』），p.524。

本日接通永李鎮自榆關來電：“英兵輪六隻，魚雷艇二隻，均泊定遠砲台前面，離岸十里，當派雷營管帶宋思鴻前往查問，據稱『來此遊歷』。後又有兵丁二十餘人登岸，欲入營，已阻回”等語。當即電行李鎮：“外國兵輪游弋海面，勢屬常有，英與我現無交涉，似不至有他意。惟當督飭各營，嚴密戒備，處以鎮靜，勿得張皇擾亂。至弁兵水手，如登岸遊歷，自難禁止，祇可派人照料，以保護為名，暗商防範。倘彼欲入營遊玩，應告以中國軍律，非奉有上憲明文，不能接待。但須婉言撫慰，妥為勸阻，斷不可嚴詞拒絕，別釀弊端。仍將該船動靜，隨時電達”云云。謹請查照。榮祿。支，未。³⁷⁾

英國軍艦在山海關的動作，可能會讓榮祿等中國官員一頭霧水，八月初二還說俄國來意不善，要保護中國，大有山雨欲來之勢；八月初四英國人則改說是“來此遊歷”，又有二十多名英國水手登岸，要進入中國軍營，而被阻回。英國軍艦似乎是要中國的官兵不要忘記他們的存在，但又不像是在向中國挑釁。八月初五，總理衙門又收到榮祿八月初四晚間的電報：

頃又得李鎮大電：“有英輪內兵丁數十人登岸，竟欲進營閱看，經該鎮婉言勸阻，旋於下午六點鐘兵輪八艘一律開行”等語，除仍飭該鎮及羅鎮嚴密瞭解，隨時電報外，謹此奉聞。榮祿。支，亥。³⁸⁾

英國的八艘軍艦終於在初四傍晚開走了。

到底英國的八艘軍艦出沒於塘沽、山海關等地的目的究竟為何？這八艘英國軍艦，與盛京、金州等地的謠言，竟然不約而同的表達了英國(與日本)即將(或已經)向俄國開戰的訊息。這些訊息，不斷地隨著一封封的電報，傳送到了北京。

3. ‘合邦’計畫的提出

37) 參見黃彰健，「論戊戌政變的爆發非由袁世凱告密」（『戊戌變法史研究』），p.524-525.

38) 參見黃彰健，「論戊戌政變的爆發非由袁世凱告密」（『戊戌變法史研究』），p.524-525.

八月初三當天，就在譚嗣同夜訪袁世凱，說以殺榮祿、兵圍頤和園等事的同時，一些變法派的官員在康有為家中聚會。康有為『自編年譜』記載：

及夜，楊漪川、宋芝棟、李孟符、王小航來慰。……(吾)以李提摩太交來「瓜分圖」，令諸公多覓人上摺。³⁹⁾

康有為「令諸公多覓人上摺」，可見此為有計畫的集體行動。在康有為的要求下，兩天後，八月初五，也就是伊藤博文晉見光緒皇帝的日子，楊深秀(漪川)上書主張與英美日‘合邦’。楊深秀說道：

臣聞刑部主事洪汝沖所上封事中，有遷都、借才兩說，而其最要最要者，莫過聯結與國之一條，蓋亦深恐新政不及布置，猝為強敵所乘，蹈波蘭之覆轍耳。……今該主事所見與臣闇合，而其語之痛切尤過於臣，是誠按切時勢之言也。

昨又聞英國牧師李提摩太，新從上海來京，為吾華遍籌勝算，亦云今日危局，非聯合英、美、日本，別無圖存之策。……況值日本伊藤博文遊歷在都，其人曾為東瀛名相，必深願聯結吾華，共求自保者也。未為借才之舉，先為借箸之籌。臣尤伏願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誠天下蒼生之福矣。⁴⁰⁾

楊深秀呼應了洪汝沖‘聯結與國’的主張，並且指出英國牧師李提摩太、東瀛名相伊藤博文，也都主張或支持「聯結吾華」，因此請求皇上“固結英、美、日本”，此處所謂的‘聯結’、‘固結’究竟所指何意？有些學者認為這是變法派主張‘聯日制俄’的外交結盟政策，如果僅是‘聯日制俄’或‘聯英美日制俄’，則是外交結盟上的選擇，這種選擇見仁見智，並沒有絕對的是非。不過，楊深秀最後又言“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可見所謂的‘聯結’，其真意為‘合邦’而非‘結盟’。

楊深秀此一主張，很明顯是在八月初三晚上由康有為授意而寫成。楊深秀在文中說李提摩太“為吾華遍籌勝算”，伊藤博文“必深願聯結吾華”、“先為借箸之籌”，可見楊深秀的‘合邦’主張是得到了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的支持，甚至可以推測是李提摩太、伊藤博文在背後籌畫推動，透過康有為的指示，

39) 康有為，『康南海自訂年譜』，p.67.

40) 楊深秀，「山東道監察御史楊深秀摺」（『戊戌變法檔案史料』），p.15.

而由變法派官員楊深秀正式提出。

楊深秀在戊戌政變後被殺，是「戊戌六君子」之一，在戊戌變法期間極為活躍。梁啟超『戊戌政變記』稱其“上書言定國是、廢科舉、譯日本書、派親王遊歷外國、遣學生留學日本等事，所條陳新政最多。”⁴¹⁾ 可見楊深秀是戊戌變法的決策核心人物。

八月初五，光緒皇帝既然已經接見了伊藤博文，對於‘借才’之事，應該要有所決定。此外，‘合邦’之事，前有洪汝沖的議論，後有楊深秀的建言，而且李提摩太、伊藤博文都在北京，也應該要有所決定。尤其根據前幾天電報，英日與俄國似乎即將(或已經)爆發戰爭，中國必須要在英日與俄國兩邊作出選擇。如果中國選擇站在英日這一邊的話，那麼對‘合邦’之事也必須有所回應。因此，在八月初六，即政變發生的當天，爲了催促光緒皇帝對‘借才’、‘合邦’等事儘快做出決定，變法派官員宋伯魯(芝棟)又上書說道：

又聞俄君在其彼得羅堡，邀集德、法、英各國，議分中國，繪圖騰報。……昨聞英國教士李提摩太來京，往見工部主事康有爲，道其來意，並出示分割圖。渠之來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爲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別練兵若干營，以資禦侮。……今擬請皇上速簡通達外務、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學士李鴻章者，往見該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與之商酌辦法，以工部主事康有爲爲參贊，必能轉禍爲福，以保我宗社。⁴²⁾

可見李提摩太交給康有爲‘分割圖’的用意，在於強調俄國的威脅，以促使變法派官員接受‘合邦’之議。宋伯魯顯然支持李提摩太“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爲合邦”的建議，而合邦的內容是“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亦即將四國的軍事、財政、外交等權力，交由四國共選的一百人來管理。可見當時變法派官員所謂的‘合邦’，的確並非只是外交上的結盟，而是交出國家大權的合併。試問即使中國同意，日本、美國、英國願意爲了防範俄國而交出各國的軍政大權嗎？李提摩太此一建議不是在誑騙變法派的官員，借‘合邦’之名，讓中國交

41)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卷四，第二章，p.6下。

42) 宋伯魯，「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宋伯魯摺」(『戊戌變法檔案史料』)，p.170。

出權力，而由英、美、日等國所控制嗎？宋伯魯還要求光緒皇帝派遣大臣（如李鴻章）與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商議，不是正好證明了李提摩太、伊藤博文是這項國際陰謀的推動者嗎？

根據英國人蘇慧廉(W. E. Soothill)所撰之『李提摩太在中國』(Timothy Richard of China)一書的記載：光緒皇帝原先預定於八月初八(9月23日)召見李提摩太，但是未及那日，而政變已成。⁴³⁾可見變法派官員還打算進一步安排“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的主角李提摩太，於八月初八晉見光緒皇帝。

康有為、宋伯魯乃至楊深秀等這些戊戌變法的重要人物，其外交常識竟如此幼稚，輕信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人的遊說，幾乎將中國主權拱手相讓。若非慈禧太后斷然發動政變，一旦光緒皇帝同意了變法派‘合邦’的主張，則中國將不堪設想矣。

4. 先發制人：慈禧太后的政變

八月初四，慈禧太后由頤和園返回紫禁城，是受了楊崇伊奏摺的影響，想要瞭解光緒皇帝是否有意重用伊藤博文，甚至交付大權。以慈禧對於新政奏摺掌握的程度，加上慈禧受楊崇伊奏摺的影響，相當重視‘引用東洋故相伊藤博文’的問題，慈禧‘有能力’也‘有意願’看到楊深秀奏摺，楊深秀這篇奏摺是逃不過慈禧法眼的。八月初五這一天，當慈禧太后看到伊藤博文晉見光緒皇帝，且由楊深秀的奏摺中得知，伊藤與李提摩太都支持中國與英、美、日‘合邦’；而變法派的決策官員，似乎也已經接受了這種主張，並向光緒皇帝正式上奏。可見情況遠比慈禧太后所預期者嚴重許多，只要光緒皇帝對重用伊藤博文或與英、美、日‘合邦’做出任何決定，聖旨一出，則不可挽回矣。如果說清朝在八月初五這一天已經危在旦夕，應不為過。

因此，慈禧太后即在次日，八月初六，發動政變，軟禁光緒皇帝，宣佈重

43) 蘇慧廉著，關志遠、關志英、何玉譯，『李提摩太在中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225。

新訓政，並且開始逮捕變法派官員。慈禧太后以光緒皇帝的名義諭令軍機大臣：“工部候補主事康有為，結黨營私，莠言亂政，屢經被人參奏，著革職。並其弟康廣仁，均著步軍統領衙門拏交刑部，按律治罪。”⁴⁴⁾

政變之後，許多官吏紛紛上書彈劾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兵部掌印給事中高燮曾於八月十一日上奏言：“從前朝鮮被倭人戕妃逼王，其明證也。”⁴⁵⁾福建道監察御史黃桂鋆上奏：“大約康有為等，內則巧奪政權，外則私通敵國，其主持變法之說，皆欺人語也。”⁴⁶⁾民間學者王先謙也批評康有為：“借兵外臣，倚重鄰敵，以危宗社，又兼崔胤、張邦昌而有之，誠亂臣賊子之尤也。”⁴⁷⁾可見當時的官僚與士大夫，已經將康有為等人的陰謀與朝鮮的「乙未事變」作比較，並發現了其中的相似之處。

不過，政變之後，慈禧太后為何不宣佈英、日的陰謀，並譴責變法派官員的賣國行為呢？筆者以為，這可能一方面是為了維持與英、日的邦交，慈禧自知中國當時沒有力量與英、日兩國為敵。英國與日本的軍事活動，始終為清朝方面所顧忌。八月初七，總理衙門收到盛京將軍依克唐阿的電報：

昨吉林復電，頃接琿春來電：「該處派員探覈(?)，並無軍務之說，惟巖杵河有馬兵五千前寓旅順」等因，謹以奉聞。依克唐阿。陽。⁴⁸⁾

八月十一日，總理衙門又接到護理直隸總督袁世凱(直隸總督榮祿於十一日上午奉召進京，旋改授軍機大臣)的電報：

頃據已革副將葉祖珪回津面稟，遵派來復濟赴金、旅確查，俄人安堵如初，實無英俄開仗及俄船受傷各事云。凱。真。⁴⁹⁾

可見英日俄開戰的謠言，到十一日才完全澄清。若是慈禧太后貿然於政變時

44) 「上諭」，《戊戌變法》第二冊，p.99。

45) 高燮曾，「兵部掌印給事中高燮曾等摺」，《戊戌變法檔案史料》，p.466。

46) 黃桂鋆，「福建道監察御史黃桂鋆片」，《戊戌變法檔案史料》，p.468。

47) 王先謙，「贈葉德輝樊彬」(王先謙，《虛受堂詩存》(光緒壬寅三月平江蘇氏刻本，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卷十五)，p.15上、下。

48) 參見黃彰健，「論戊戌政變的爆發非由袁世凱告密」，《戊戌變法史研究》，p.525。

49) 參見黃彰健，「論戊戌政變的爆發非由袁世凱告密」，《戊戌變法史研究》，p.525。

就宣布英、日兩國的陰謀，與英、日兩國對立，不啻表明了在英日與俄國的戰爭中，中國是站在俄國這一邊，這種表態對中國顯然沒有好處。因此，慈禧太后雖將光緒軟禁於瀛台，並且大舉搜捕變法派官員，但對於事件本身卻諱莫如深，只以康有為等變法派人士「結黨營私，莠言亂政」等含混的理由，作為政變的藉口。

5. 英國與日本的角色

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一書，根據日本外務省的檔案，認為日本駐華使館對於變法時期的新政內容，對外務省做了詳細的呈報，但是日本政府卻反應冷淡，沒有具體的指示與意見，一直到政變之後，日本政府的態度才有了大轉變，開始營救康有為、梁啟超，並向清廷關切光緒皇帝‘廢立’的問題。⁵⁰⁾然而，本人認為日本政府在戊戌政變之前，即與康有為有密切的聯繫，日本公使矢野文雄曾經與康有為計畫召開「合邦大會議」，可見日本一開始即有意透過康有為的影響力，在中國推行‘合邦’計畫。變法開始後，更利用伊藤博文訪華的機會，推行‘借才’、‘合邦’的計畫，企圖控制瓜分中國。而這一切，在茅海建先生查閱的日本外務省檔案中，卻完全看不出來。本人以為，由於現在開放供學者查閱研究的外交檔案，都是經過‘整理’過的檔案（世界各國皆然），大概很少有國家會把策劃他國政變的秘密資料，加以公開公布。而且，策劃他國政變的計畫，通常不會在一般駐外使館的例行報告中出現。因此，戊戌變法時期的日本駐華使館（公使矢野文雄除外）乃至日本外務省，不見得完全知道伊藤博文等人‘借才’、‘合邦’的計畫，但是我們不能因為日本檔案之中沒有‘借才’、‘合邦’的內容，就認為當時不存在‘借才’、‘合邦’的計畫。畢竟，楊深秀、宋伯魯的奏摺，康有為的『自編年譜』，都清楚的呈現了‘借才’、‘合邦’的計畫，也證實了英國教士李提摩太、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皆參與其事。

50) 茅海建，「日本政府對於戊戌變法的觀察與反應」（『戊戌變法史事考』），pp.463－564。

此外，在英國外交部檔案(F. O.)之中，同樣也很難看出英國與‘合邦’計畫的關係，我們只能從各種檔案史料中，找出一丁點的蛛絲馬跡。根據英國1899年3月出版的*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China,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中國事件藍皮書)第394號附件「海軍中將西摩(Vice Admiral Sir E. Seymour)致海軍部」的信函，西摩中將向英國海軍部報告：

參照九月二十三日我的電報，我向您報告十六、十七日我在北戴河晤見了帝國公使寶納樂，他對我說，事態一般看來似乎是平靜的，既沒有理由在這海面或在揚子江上集中了帝國的軍艦，也不需要艦隊作任何特別的處置。……因此，我帶著艦隊出發，作了一個已經呈報了的短程預定巡航，在二十三日回到威海衛。⁵¹⁾

西摩中將在陽曆九月十六、十七日(陰曆八月初一、初二)在北戴河會見了英國駐華公使寶納樂(Sir C. MacDonald)之後，便率領艦隊作‘短程預定巡航’。直隸總督榮祿也在八月初二起，陸續收到英國軍艦出沒的消息，並有英國軍人告訴中國官兵：“英俄即將開仗，特來保護中國。”筆者推測，西摩中將的‘短期巡航’，很可能是受了英國公使寶納樂的指示，利用英國軍人登岸之際，散播‘英俄即將開戰’的謠言，以逼使光緒皇帝在英日與俄國之間做出選擇，甚至接受‘合邦’的主張。如果這一推論成立，那麼英國駐華公使寶納樂便與‘合邦’的陰謀脫不了關係。

戊戌政變後，英國公使寶納樂曾致電英國外交大臣，說道：“認為這次政變是受外國影響而促成的，那是毫無根據的猜想。”⁵²⁾ 據此推斷，如果寶納樂參與‘合邦’之事，也應該是瞞著英國外交部的行為，所以才會在計畫失敗後向英國外交部否認“政變是受外國影響而促成的。”寶納樂又在致英國外交大臣的信中說道：“我認為中國正當的變法，已大大被康有為和他朋友們的不智行為搞壞了。”⁵³⁾ 可見寶納樂在政變之後，似乎有意撇清與康有為之

51) 『中國事件藍皮書』第394號 附件，發信時間地點：1898年10月2日於威海衛 Centurion號軍艦(『戊戌變法』第三冊)，p.550。

52) 「寶納樂致英國外交大臣電」(『中國事件藍皮書』第262頁 第353號，發電時間為1898年10月11日，『戊戌變法』第三冊)，p.531。

間的關係。

在竇納樂給英國外交大臣的信中，附上了康有為搭英國輪船逃往香港途中，和英國人賈克憑(Cockburn)談話的備忘錄，備忘錄中說道：“他(康有為)漫談了一些盼望英美聯盟保護中國，以及沙俄控制住中國廣大人群以後對世界各國的威脅，但這不過是背誦他學得的廣泛的政見而已。”⁵⁴⁾ 賈克憑認為康有為「英美聯盟保護中國」的意見只是泛泛之論而已，似乎也不知道‘合邦’的計畫已經由楊深秀、宋伯魯等人上奏光緒皇帝，很有可能付諸實行。

此外，英國駐上海總領事班德瑞(Baurne)在他與康有為談話的備忘錄中說：“康有為是一位富於幻想而無甚魄力的人，很不適宜作一個動亂時代的領導者，很顯然的，他被愛好西法的熱心所驅使，同時又被李提摩太的一些無稽之談所迷惑。”“李提摩太是英國教會駐北京的辦事人，他是個陰謀家，他大約向康有為和維新派作了一些愚蠢的建議。”⁵⁵⁾ 可見英國在上海的外交官，也與主張‘合邦’的李提摩太劃清界限，認為李提摩太的意見都是‘無稽之談’、‘愚蠢的建議’，李提摩太的行為只是「個人行為」，與英國政府無關。

因此，對於英國政府(尤其是駐華公使竇納樂)所扮演的角色，仍有更進一步加以研究的必要。

V. 結 論

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阻止了變法派官員‘合邦’的計畫，使中國免於被日本、英國瓜分的危機。不過，也許讀者會質疑，康有為‘合邦’的計畫，後果真的有這麼嚴重嗎？由於康有為的‘合邦’計畫已經被慈禧太后的政變所制

53) 「竇納樂致英國外交大臣信」(『中國事件藍皮書』第303頁 第401號信札，發信時間為1898年10月13日，『戊戌變法』第三冊)，p.532。

54) 「竇納樂致英國外交大臣信」附件二「由申赴港途中與康有為談話的備忘錄(1898年9月27日至29日)」(『中國事件藍皮書』第303頁 第401號信札，發信時間為1898年10月13日，『戊戌變法』第三冊)，p.536。

55) 「白利南致英國外交部次大臣信」(『英國外交部檔案』(F. O.) 17/1718，發信時間為1898年9月26日，『戊戌變法』第三冊)，pp.527-528。

止，因此‘合邦’在中國並沒有付諸實現的一天，如此一來，我們又要如何評估‘合邦’對中國可能造成的危害呢？

要評估‘合邦’對中國造成的危害，我們可以參考韓國的‘合邦’經驗。光緒二十一年的「乙未事變」，日本派軍包圍朝鮮皇宮，並由殺手進入皇宮殺害閔妃，不正與譚嗣同遊說袁世凱“殺榮祿，兵圍頤和園”，然後由‘好漢、好將’進入頤和園‘去此老朽’，其過程完全如出一轍嗎？

光緒二十二年(1896)，朝鮮國王逃到俄國公使館尋求保護，總算暫時擺脫了日本的壓迫。然而到了光武八年(光緒三十年，1904)陽曆2月，隨著日俄戰爭爆發，日軍再度大舉進入韓國，逼迫韓國簽訂「韓日議定書」；同年陽曆8月，再逼迫韓國簽訂「第一次韓日協約」，韓國之財政、外交皆須聽從日本顧問的意見以施行之。

次年，光武九年(光緒三十一年，1905)，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戰勝之後，於陽曆11月以樞密院院長伊藤博文為特派大使，逼迫韓國簽訂「第二次韓日協約」(乙巳條約)，日本得在韓國設置「統監」，統理指揮今後韓國對外國的關係以及事務。而首任統監，即是伊藤博文。日本利用顧問、統監掌控韓國的政治外交，這與戊戌變法時期重用伊藤博文的‘借才’之議，豈不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光武十一年(光緒三十三年，1907)，高宗李熙由於受不了日本的壓迫，趁著「第二次萬國和平會議」在荷蘭海牙舉行之際，派遣前議政府參贊李相高、前平理院檢事李儁、前駐俄公使館書記官李瑋鐘等三人，秘密潛赴海牙，向和平會議主席及各國代表提出高宗李熙的密書，並要求參加會議。結果，會議議長以韓國已成為日本的保護國，沒有外交權為由，予以拒絕。李儁悲憤交集，自殺而死。海牙密使的消息傳回韓國，統監伊藤博文譴責韓國政府：“漠視協約精神，敵視日本，故日本不得不向韓國宣戰。”最後，高宗李熙宣布讓位，由太子純宗即位，改年號為‘隆熙’。由此可見，‘借才’一旦付諸實施，就沒有回頭的機會了。

隆熙三年(宣統元年，1909)，日本開始積極推動‘合邦’的計畫。在日本人的壓力之下，隆熙四年(宣統二年，1910)陽曆8月，韓國終於被迫簽下了「合併條約」，成為了日本的殖民地，這就是‘合邦’的真相。

不過，由於我們對戊戌政變的理解，常常視為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派對改革派的反撲。因此我們對於改革派，大多抱持著同情的立場；而對於所謂的保守派，則抱持否定的態度。在這種‘進步史觀’的影響下，對於保守、守舊、反進步的‘逆流’，很難給予正面的評價；而對於改革派所犯的嚴重錯誤，卻常常視而不見，予以淡化。因此，若不跳出‘進步’、‘守舊’二分法的史觀，我們很難釐清歷史的真相。

實際上，以康有為為核心的變法派官員，大多年輕、資淺而無國際經驗。舉例言之，本文曾提到洪汝沖主張‘聯邦’時，曾舉挪威、匈牙利的例子，認為“挪威以合於瑞典而得自存，匈牙利以合於奧地利而不滅。”然而事實上，挪威原為丹麥領土，1814年割讓於瑞典，並非為了求生存自願與瑞典合併。匈牙利人原為奧國國內的少數民族，意欲脫離奧地利獨立，奧國不得已於1867年將帝國改組為‘奧匈帝國’，以緩和匈牙利人民族主義的高張情緒，也絕非匈牙利人為求‘不滅’而自願與奧國合為一國。從這些錯誤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變法派的官員，對於西方歷史一知半解，很容易在外人的誘導遊說之下，接受其包藏禍心的理論。尤其，光緒二十四年初，西方列強紛紛向中國要求租借港灣，劃分勢力範圍，更使中國知識份子認為國家危在旦夕，改革救國必須速成。在這種氣氛之下，使得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人有機會將「合邦」的陰謀，包裝在各種變法改革的藍圖當中，誘使康有為等人接受其主張。康有為、譚嗣同、楊深秀、宋伯魯等人，無論他們是有意配合伊藤博文等人的陰謀，或者是這些人急於求成，誤信了伊藤博文、李提摩太的詭計，他們讓中國面臨了被瓜分兼併的危機，還是難辭其罪的。

本文的主旨，在於說明戊戌變法時期，尤其是伊藤博文來華之後，伊藤博文與李提摩太等人希望借戊戌變法的機會，利用變法派官員掌握決策核心的便利，意圖實行其‘合邦’的陰謀，而‘借才’則是其具體手段。對於可能阻礙‘借才’、‘合邦’計畫的慈禧太后與榮祿，則打算利用袁世凱的軍隊“殺榮祿、兵圍頤和園”，重複日本人在朝鮮乙未事變時的作為。慈禧太后是在明瞭當時情勢險峻之後，才當機立斷發動政變，挽救了此一危局。本文無意把慈禧太后描繪為民族英雄，慈禧太后一生也有許多缺點，但是在戊戌政變此一事件上，慈禧太后卻是維護了清朝的國祚，使中國免於瓜分兼併之禍。而透過

以上的分析，也許我們可以對戊戌變法與戊戌政變的歷史，得到與傳統說法完全不同的解釋與評價。

(한글요약)

잃어버린 진실

－ 청말 무술변법시기의 “합방”론과 무술정변의 관계－

雷家聖 (台灣大)

1. 서론

광서 24년(1898)에 일어났던 무술변법(변법자강운동)은 중국 근대사에서 중요한 역사적 사건이다. 무술변법은 자희태후(서태후)가 일으킨 정변—무술정변에 의해 결국 실패로 끝났다. 무술정변의 발생 원인에 대해 자희태후를 우두머리로 한 완고 보수세력의 반격으로 보는 관점이 일반적이다. 하지만 자희태후가 개혁을 반대하는 입장이라면 광서제가 ‘제도개혁(更新國是)’을 선포 할 때부터 저지하였을 것이고, 그렇게 되면 모든 개혁이 수포로 돌아가게 되는데 왜 백일하고도 삼일이 지나서야 정변을 일으켰는지? 이것이 많은 사학자들이 ‘보수 세력의 반격’설을 놓고 엇갈린 주장을 펴고 있는 원인이다.

다른 일설에 의하면, 원세개(袁世凱)의 밀고가 정변의 원인이라고 하는데, 이런 설도 문제점이 있다. 광서 24년 8월 3일(양력 9월 18일) 밤, 담사동(譚嗣同)은 비밀리에 원세개를 방문하여 직예총독 영록(直隸總督榮祿)을 처형하고 군대를 풀어 의화원(頤和園)을 포위할 것을 부탁하였다. 원세개는 8월 5일(9월 20일) 천진에 돌아가서야 영록에게 모든 사실을 밀고했다. 따라서 그가 영록에게 밀고한 시간은 빨라야 8월 5일 저녁 이후일 가능성이 높는데, 자희태후가 정변을 일으킨 시간이 8월 6일(9월 21일)인 점을 감안하면 어떻게 하루 만에 천진으로부터 밀고를 받아 정변을 획책하였는지? 사학자들은 시간적으로 너무 빠듯한 점에 대해 의문을 제기하고 있다.

본고는 무술정변 발생의 진정한 원인은 무술변법시기 강유위(康有爲) 등 변법파들이 일본 전임 수상 이토 히로부미와 영국선교사 티모

시·리처드 등의 유세에 넘어가 ‘중국, 미국, 영국, 일본의 4국 합방’ 계획을 시도한데 있다고 본다. 자회태후는 사태의 엄중함을 인식하고 제때에 결단을 내리고 정변을 일으킨 것으로 보여진다. 이러한 관점은 설득력이 있는지? 이 문제는 ‘합방’의 유래로부터 알아보아야 할 것이다.

2. 무술변법 이전의 ‘합방’론

중국어에는 ‘합방(合邦)’이란 어휘가 없었다. 이 어휘는 일본으로부터 전해 온 것이며, 모리모토 도키치라는 일본인이 메이지26년(광서 19년, 1893)에 쓴 ‘대동합방론’이란 책에서 처음으로 사용되었다. 이 책은 한국이 일본과 하나의 국가로 되어야 한다고 표방하였지만, 결국 합방의 목적은 한국을 식민지화하려는 데 있었다. ‘합방’이라는 중간적 어감의 어휘를 선택한 것은 침략과 병탄의 의도를 덮어보려는 의도였다고 생각된다. 광서 20년(1894) 중일갑오전쟁(청일전쟁)이후 중국 내 반일정서가 한껏 고조된 상황에서 일본은 중국의 지식인을 상대로 적극적인 유세(遊說)를 펼쳤다. 광서 22년(1896, 일본 메이지 29년), 일본 정계 대부 이누카이 쓰요시는 “중국 문제는 처리하기 쉽지 않으므로 대중국 정책을 확립하는 것이 급선무”라고 주장하였다. 광서 23년(1897), 일본인 宗方小太郎은 상해에서 평소 가까이 지냈던 이성탁(李盛鐸), 나성백(羅誠伯), 양계초(梁啓超), 왕강년(汪康年) 등 사람들과 아시아 부흥의 계획에 관해 논의하였다. 광서 24년 무술변법의 시작에 앞서 일본은 ‘동아회(東亞會)’, ‘동문회(同文會)’ 등 기구를 설립하여 강유위, 양계초 등 당시 변법과 핵심인물들을 적극 끌어들이었다. 광서 24년 초에 강유위는 심지어 중국주재 일본공사 야노 후미오와 중·일 양국의 ‘합방대회(合邦大會議)’를 개최할 계획까지 세웠다. 무술변법이 시작되기 전부터 일본이 중국과의 ‘합방’ 추진을 꾀하고 있었음을 보여주는 실례이다.

3. 이토 히로부미가 중국에 왔을 때 ‘인재영입(借才)’의 의미

광서 24년, 광서제는 변법유신에 관한 강유위의 주장을 받아들였고, 그 해 4월 23일(6월 11일) 조서를 내려 ‘제도개혁’을 정식으로 진행하였다. 이것이 바로 무술변법, 백일유신의 시작이다. 변법이 시작된 후 낡은 기관 축소, 군대의 서양식 훈련, 과거제도(팔고문 폐지, 책론<策論> 시험) 개혁, 신식 학교 설립, 공사업 발전 등 새로운 정책이 잇따라 실시되었다. 하지만, 청조 정부의 각종 개혁정책이 부단히 반포·실시될 때 변법파의 관리들은 ‘인재영입’, ‘합방’ 등 계획을 제기하기 시작하였다. 이러한 관점을 처음으로 제기한 사람은 형부주사(刑部主事) 홍여충(洪汝沖)이다. 그는 광서제에게 상주문을 올려 서양의 제도를 본받을 바에는 ‘동서 각국의 명사<名士>’를 초청하고 실권을 주어 중국의 개혁을 돕게 해야 한다고 주장하였다. 그는 또 일본 수상직을 사임하고 중국의 곳곳을 돌아다니고 있는 이토 히로부미에게 관작을 하사하고, 수시로 자문을 구하여 신정개혁에 도움이 될 수 있도록 황제의 가까이에 둘 것을 건의하였다. 여기에서 홍여충이 ‘동서 각국 명사’의 이상적인 책임자로 이토 히로부미를 생각하고 있음을 알 수 있다. 그 외에 홍여충은 ‘국가결합(聯邦)’까지 주장한 인물이다. 즉 중국과 일본의 관계는 “유럽이나 서양에 있었다면 한 나라로 합치는 것도 무난했을 것이다”고 말하면서 중국과 일본은 합병 가능하다고 주장하였다. 광서제가 이런 상주문을 받고 무슨 반응을 보였을지 지금으로서는 알 수 없다. 하지만 홍여충의 말대로 7월 26일(9월 11일) 이토 히로부미는 정말로 중국에 왔다.

강유위는 이토 히로부미가 중국에 도착하자 곧바로 상해에 있는 영국선교사 티모시·리처드를 북경으로 초청하였다. 티모시·리처드는 일찍 광서 21년(1895) 중국이 갑오전쟁에서 패배한 후 ‘신정책’이라는 책을 써 중국의 외교, 신정, 철도, 차관, 신문, 교육 등 분야의 권력은 모두 서양인이 통제해야 한다는 주장을 펼친 적이 있다. 무술변법이 시작된 후 그는 강유위와의 만남에서 “이토 히로부미가 일본을 강국으로 발전시켰다는 점에서 보아 그를 황제의 고문으로 위촉하면 중국정부에게 가장 득이 될 것이다.”고 하였다. 티모시·리처드가 북경에 도착한 후

이토 히로부미가 머물고 있는 여관에 거처를 정한 것으로부터 두 사람의 관계가 아주 각별하였음을 알 수 있다.

이토 히로부미가 중국에 온 후 광서제는 칙령을 반포하여 국내 및 동서 각국의 전문가들이 무근전(懋勤殿)에 모여 국가 정치제도의 개혁 문제를 함께 논의하도록 하였다. 변법과 관리들도 잇달아 상주문을 올려 이토 히로부미로부터 변법개혁에 관한 조언을 구할 것을 요청하였다. 그 예로 다음과 같은 것들이 있다. 섭흥은(聶興圻)은 중국의 개혁에 일조할 수 있도록 외국 인재를 등용할 것을 광서제에게 주청했다. 진무정(陳懋鼎)은 광서제가 이토 히로부미를 만날 때 일본 메이지유신의 경험에 대해 논의하기를 희망하였다. 복자동(濮子潼)은 광서제에게 이토 히로부미가 북경에 있을 때 총리사무왕대신을 비밀리에 파견하여 개혁에 관련된 조언을 구할 것을 요청하였다. 상기 의견보다 더 극단적인 의견도 있었는데, 귀주 거인(擧人) 부기(傅夔)는 이토 히로부미에게 재상과 대등한 관직을 하사할 것을 희망하는 상주서를 올렸고, 진시정(陳時政)도 이토 히로부미에게 신정개혁의 실제사무를 맡길 것을 희망하는 상주서를 올렸다.

당시 북경의 관료사회에는 ‘무근전을 열고’, ‘이토 히로부미를 중용’하는 문제와 관련된 소문이 널리 퍼졌다. 다른 일각에서는 이런 소문에 대해 경각심을 갖는 관리들도 있었다. 8월 3일(9월 18일) 어사 양송윤(楊崇伊)은 자희태후에게 “광서제가 이토 히로부미를 등용하면 조상이 물려준 강산이 멸망의 위협에 빠질 수도 있다”고 진언하였다. 그 당시 자희태후는 의화원에 머물러 있으면서 정치에 관여하지 않는다고 볼 수 있으나, 모해건(茅海建)선생님의 연구에 의하면 군기처(軍機處)는 매일 일반적인 상주문의 요점과 중요한 상주문 전체를 베낀 사본을 자희태후에게 전하였을 것이라 사료된다. 양송윤의 보고를 접한 자희태후는 한편으로 신정과 관련된 모든 상주문을 올리도록 군기처에 명함과 동시에 다른 한편으로 광서제의 생각을 직접 파악하기 위해 8월 4일 자금성으로 돌아왔다.

4. ‘이화원 포위’와 ‘합방’ 계획

8월 3일, 이날에 두 가지 사건이 발생하였다. 첫째는 양송윤이 자희 태후에게 상서한 일이고, 둘째는 이날 저녁 담사동이 원세개를 찾아간 일이다. 담사동은 원세개에게 직예총독 영록을 죽이고 군사를 풀어 이화원을 포위할 것을 요구했다. 그러나 원세개는 8월 5일 천진에 돌아가 영록에게 이 일을 고해바쳤다.

이외에 우리는 두 가지 사건에 주목할 필요가 있다. 중국의 진황도, 산해관 일대에 영국군함이 출현하였고 군함에서 내려온 영국 사병이 중국인에게 ‘러시아의 의도가 불순하니 영국정부가 중국을 보호하고자 군함을 파견하였다’고 하였다. 영국과 러시아가 조만간 전쟁을 할 것 같다는 의미로 풀이된다. 또한 중국의 동북에서도 영국과 일본이 러시아를 상대로 전쟁을 시작하였다는 헛소문이 돌고 있었다.

8월 3일 저녁 강유위는 변법과 관리인 양심수(楊深秀), 송백노(宋伯魯) 등 사람을 만나 티모시·리처드가 전한 ‘영토분할도(瓜分圖)’를 보여 주면서 “사람을 많이 찾아 상주문을 올릴 것”을 요구하였다. 이것이 계획적인 행동임을 입증하는 예이다. 8월 5일(9월 20일), 이토 히로부미가 광서제를 알현하는 날, 강유위의 지시를 받은 양심수는 광서제에게 러시아의 위협에 대비해 “영국, 미국, 일본과 연합하지 않으면 국가의 생존을 도모할 방법이 없다”고 상서하였다. 또한 광서제가 “영국, 미국, 일본과 굳게 연합할 것을 조속히 결정하고 ‘합방’이란 이름이 아름답지 않은 것을 개의치 말 것”을 희망하였다. ‘합방’이란 말이 정식으로 제기된 것이다. 그 이튿날인 8월 6일, 즉 정변이 발생한 당일, 광서제가 ‘인재영입’, ‘합방’ 등 사안에 대해 조속히 결정을 내릴 수 있도록 다른 한 변법파 관리인 송백노도 광서제에게 상서하였다. 그는 러시아에서 중국을 분할하려는 계획과 지도가 신문에 실렸다고 주장하면서 “티모시·리처드가 중국, 일본, 미국 영국의 합방을 시도하고 있으며, 네 개 국가에서 함께 당면한 정세와 각국의 제도에 밝은 사람 백 명을 뽑아 네 개 국의 군대, 정치, 세금(兵政稅) 및 모든 외교 사무를 맡겨야 한다”고 하였다. 다시 말해 ‘합방’의 계획이란 바로 중, 미, 영, 일 4

국에서 ‘군대, 정치, 세금 및 모든 외교 사무’와 관련한 권력을 네 개 국가에서 공동으로 선출한 백 명이 장악하도록 하는 것을 말한다. 실제로 이것은 근본적으로 가능하지 않은 일로 확연히 드러나는 외교적 사기이며, 중국의 정치권력을 빼앗아 마음대로 짓밟으려는 의도가 깔려 있는 것이다.

자희태후가 신정 관련 상주문을 파악하고 있는 정도, 그리고 양승윤의 상주문으로부터 받은 영향으로 추론하여 볼 때 그는 ‘동양의 전직 수상 이토 히로부미를 등용’하는 문제를 아주 중요시했을 것이며, 또한 양심수의 상주문을 볼 ‘능력’과 ‘의향’이 있었을 것으로 사료된다. 때문에 자희태후는 변법과의 ‘합방’ 계획을 발견하자 곧바로 문제의 심각성을 깨닫고 그날 즉시 정변을 일으켜 광서제를 연금하였던 것이다.

티모시·리처드와 이토 히로부미가 ‘합방’ 계획과 밀접히 연관되지만, 영, 일 양국 정부가 이 일에 개입되었는지는 후속 연구를 통해 밝혀져야 할 것이다. 모해건 선생님은 일본 외무성 자료에 대한 분석을 통해 무술변법에 대한 일본정부의 태도가 냉담했으며 구체적인 지시나 의견이 없는 것으로 보고 있다. 그러나 이런 정례 보고는 일본의 진정한 의도를 반영하지 못할 수도 있다. 중국주재 영국공사 맥도날드(Sir C. MacDonald)가 8월 초에 해군중장 세이무어(Vice-Admiral Sir E. Seymour)를 만난 후, 세이무어는 함대를 거느리고 짧은 순항을 하였으며, 바로 이때 영국사병이 ‘영국과 러시아가 곧 전쟁을 할 것’이라는 소문을 퍼뜨렸던 것이다. 맥도날드와 세이무어가 이런 방식을 통해 ‘합방’의 계획을 받아들이도록 광서제에게 압력을 가했는지 현재로서는 파악할 수 없다. 하지만, 영국과 일본의 문서에 ‘합방’의 내용이 기록되지 않았다 하여 당시 ‘합방’ 계획이 존재하였음을 부정할 수 없다. 양심수, 송백노의 상주문과 강유위의 ‘자편년보(自編年譜)’에는 ‘인재영입’과 ‘합방’ 계획이 명백하게 기재되어 있으며, 영국선교사 티모시·리처드와 일본 전임 수상 이토 히로부미가 모두 이 일에 참여하였음이 실증되었기 때문이다.

5. 결론

한국이 일본에 의해 합병되는 과정 중 1985년 ‘을미사변’이 일어났다. 이 사변에서 민비(명성황후)가 살해된 것은 담사동이 원세개를 찾아서 부탁했던 ‘이화원 포위’ 계획과 아주 유사하다.(계획이 성사되었다면 자희태후도 똑같은 최후를 맞았을 것이다.) 1904년 일본은 한국으로부터 군대주둔권을 획득하고 재정고문, 외교고문을 설치하였는데, 이것은 송백노가 ‘군대, 정치, 세금 및 일체 외교 사무’를 외국에 맡겨야 한다고 주장했던바와 아주 흡사하다. 그 뒤 1910년 일본은 ‘합방’의 명의를 빌어 한국을 병탄하였다. 한국의 가슴 아픈 교훈을 통해 ‘합방’이란 다른 나라를 병탄하려는 음모임을 보아낼 수 있다.

본고는 자희태후를 민족의 영웅으로 부각하려는 의도가 없다. 자희태후는 단점이 많았던 인물이다. 그러나 무술정변이라는 역사적 사건에서 자희태후는 나라의 운명을 수호하였고, 중국을 분할과 병탄의 위기로부터 구해냈다. 강유위, 담사동, 양심수, 송백노 등 ‘인재영입’과 ‘합방’을 주장한 주요 인물들은 이토 히로부미와 같은 자의 음모에 의도적으로 동참했는지, 아니면 변법 목적 달성에 급해 이토 히로부미와 티모시·리처드의 간계에 속아 넘어갔는지를 불문하고, 중국을 분할과 병탄의 위기에 처하게 하였으므로 과오가 아주 크다. 상기 분석을 통해 무술변법 및 무술정변의 역사에 대해 기존의 전통 학설과 완전히 다른 해석과 평가를 도출해냈다.

주제어 : 무술변법, 무술정변, 자희태후, 강유위, 이등박문, 티모시 리처드, 차재, 합방, 양심수, 송백노

關鍵詞 : 戊戌變法, 戊戌政變, 慈禧太后, 康有爲, 伊藤博文, 李提摩太, 借才, 合邦, 楊深秀, 宋伯魯

Keywords : Hundred Days' Reform, The Coup of 1898, Empress Dowager Cixi, Kang Youwei, Itō Hirobumi, Timothy Richard, brain-gaining, federation, Yang Shenxiu, Song Bolu

(원고접수: 2009년 6월 20일, 심사완료: 8월 5일, 심사결과통보 및 수정요구서 받

송: 8월 7일, 수정원고접수: 8월 19일, 게재 확정: 8월 25일)